

隋代的古籍整理

汪受宽

《宋史·艺文志》说：“历代之书籍，莫厄于秦，莫富于隋。”同是短祚的一统王朝，书籍的命运却截然相反。隋代搜集与整理古籍的经验是值得总结的。

一，古籍的搜求、抄副和收藏

古籍整理的基础，是书籍的大量收藏。中国古代自西晋末年以后的二百七十多年间，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，书籍屡聚屡散，损失是很大的，以至到隋初，只有“御书单本合一万五千余卷，部帙之间，仍有残缺。”^①

隋统一，铲除了阻碍书籍流通的分裂割据状态；二十多年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，又给大量搜集与整理古籍创造了较好的政治条件；经济的发展，更为之奠定了较好的物质基础；统一后各地学者荟萃一堂，各种学派和思想争妍斗丽，又促进了古籍整理水平的提高。

隋王朝从一开始就注意书籍的搜求，秘书监牛弘是隋初搜求书籍的倡导者。开皇三年初，他“以典籍遗逸，上表请开献书之路”。他列数了自秦至陈书籍的“五厄”，认为战争和政治混乱是造成历代书籍损失的主要原因。如今“土宇迈于三王，民黎盛于两汉。……方当大弘文教，纳俗升平。而天下图书尚有遗逸，非所

以仰协圣情，流训无穷者也”。强调“为国之本，莫此攸先”。^②隋文帝采纳了牛弘的建议，派遣使者到全国各地搜访遗书异本，规定“每书一卷，赏绢一匹，校写既定，本即归主”。^③当时，不仅一般书籍，佛经、碑铭和时人手稿都在搜求范围。由于朝廷重视，赏格又高，朝野很快形成了一股献书热，“民间异书，往往间出”。经过几年的购求，秘书省所藏书籍已很可观。这是隋代第一次搜求书籍。

第二次搜求书籍在平陈之役。南北朝时，南朝自视为“华夏正宗”，各朝统治者都比较重视文化事业。为了完整地接受陈朝的藏书，开皇九年隋军攻破丹阳，行军元帅晋王杨广派裴矩、高颍“收陈图籍”。^④在大劫之后，使行将为兵燹所焚的书籍保存了下来。这时，牛弘再次“奏请搜访遗逸”，^⑤从而在更广大的疆土上搜求书籍。

隋炀帝在历史上虽以暴虐、淫佚闻名，却又是一个“好学，喜聚逸书”^⑥的君主。他即位后，开始了隋代第三次搜求古籍。这次聚书，兼及道藏以及书法、绘画作品，范围更为扩大。

为了使罗致的书籍充分发挥作用，并避免重新佚失，隋代很重视书籍的挑选、补缺、抄副和收藏。

挑选古本精本补足缺本是隋代一再进行的工作。平陈所得“多太建（陈宣帝年号）时书，纸墨不精，书亦拙恶”。^⑦但其中却有秘书省缺藏的书，也有原藏书中佚失的篇章。于是，将秘书旧藏与平陈所得予以通盘整理。第一步，挑出单本；第二步，有复本的“存为古本”，剔除那些抄录时代较近而谬误较多的复本；第三步，用不同的本子将残缺的书抄全。这样，总共整理出三万多卷单本。经过陆续搜求，大业初年，西京（大兴城）嘉则殿藏书已达三十七万卷。炀帝下令秘书监柳胥等人再一次挑选整理，不仅剔除抄校不精的复本，而且摒弃了那些内容“猥杂”质量低劣的书，挑出藏书中的精品三万七千余卷，名之为“正御

书”，^⑧专供炀帝阅读。这事实上是中国古代综合性丛书的第一次编选。

抄录副本和妥善收藏，是发挥书籍的作用，避免其重新失传的关键。开皇三年购求遗书时，就采取了向书主借来校定抄写，然后将原本归还书主的办法。开皇九年，挑选出三万多单本以后，更“召天下工书之士，京兆韦霁、南阳杜颀等”，在秘书省内把这些书精心抄出正副两种本子，收藏于西京宫中，其余的书籍仍储于秘书省内、外阁。炀帝时，为使三万七千卷正御书发挥更大作用，下令缮写了五十套副本，分别藏于西京和东都的各宫、省、官府，^⑨同时建立了五十个藏有数万卷典籍的书库。几十个藏书处中，以储正御书的观文殿书库最为考究。殿前新建十四间书库，东屋藏甲、乙部书，西屋藏丙、丁部书。各屋都饰有奢华的锦幔，装有机关开启的门扇。书卷都以织花绮精心裱糊，卷轴用红琉璃或绀琉璃制成，包头也以织绵为之。殿后还建筑了两区楼台，收藏历代书法和绘画珍品。由于隋炀帝多次巡幸江都，后期江都也成为重要的藏书地。除国家藏书外，大臣、文人的私人藏书也不少。秘书丞许善心“家有旧书万余卷”，^⑩洹水县令张琬也“有书数千卷”。^⑪官府藏书的借阅似乎有一定的限制。著作郎虞绰违反规定，“以禁内兵书借（杨）玄感，帝甚衔之”，^⑫反映了当时借阅制度的严格。

从上述各数总计，隋代官府藏书总数当在二百万卷以上。那么，剔除大量副本，单本究竟有多少呢？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为我们提供了可资考证的基本数字。该志总序云：“大唐武德五年，克平伪郑，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。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，泝河西上，将致京师，行经底柱，多被漂没，其所存者，十不一二。其《目录》亦为所渐濡，时有残缺。今考见存，分为四部，合条为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，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”。郑为王世充在洛阳所建政权。平郑所得图书皆为隋东都旧藏。这些

书在遭受严重损失后，还能挑出单本八万九千多卷，那么原来东都藏书的书目至少也在十万卷以上了。要知道，号称“藏书之盛”的唐开元时，只有书八万二千多卷，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书不过十一万九千余卷，相形之下，我们不能不信服历代之书籍，“莫富于隋”的说法了。

二、多种图书目录的编制

在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的基础上编制图书目录，是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内容。有隋一代，学者根据国家藏书，先后编成了多种综合书目和专科目录，不仅反映了一代藏书之盛，而且在目录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，还给《隋书·经籍志》的编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和两《唐志》所载，隋代综合性的藏书目录，先有牛弘的《开皇四年四部书目》四卷、《开皇八年四部书目》四卷。这两部书目修于平陈之前，著录图书当不超过三万卷。其后又有《香厨四部目录》四卷、王劼《开皇二十年书目》四卷和许善心《七林》。《香厨四部目录》疑为开皇九年平陈后，整理出的三万多卷藏书的目录。大业年间，有柳晋《大业正御书目录》和《隋书·经籍志总序》提到的那部著录十几万部书的目录。

这些书目，多系奉敕所修，体例并无特殊之处。但是它们多依荀勖创制的四部分类法著录图书，反映了四部分类法在当时已趋于定型。《七林》是一部值得注意的书目。史载，开皇十七年，许善心“除秘书丞。于时秘藏图籍尚多淆乱，善心仿阮孝绪《七录》，更制《七林》。各为总叙，冠于篇首。又于部录之下，明作者之意，区分其类例焉”。^⑬《七录》的分类法，包括了佛道著作，是一种历史的进步，但无大小序。《七林》仿效《七

录》的分类法，但增加了七篇“总序”和“区分类例”的小序。大小序既是对各种学术思想的分类，又是对各类学术研究历史源流和得失的探讨，不仅对学术史的研究有重大意义，而且有指导读者做学问门径的功用。章学诚指出：“校讎之义，盖自刘向父子，部次条别，将以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，非深明于道术精微，群言得失之故者，不足与此。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，代有其人，而求能推阐大义，条别学术异同，使人由委溯源，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，千百之中不十一焉”。^⑪许善心之著《七林》，可算是属于这种“能阐大义，条别学术异同”的高手了。查《隋志》将佛道附入子类，总为四部，其大小类的分法与《七录》基本相同，且都有总序、小序。给《隋志》写序提供参考的，当然就是许善心的《七林》了。

隋代编制的专科书目首推佛经目录。隋代两朝君主都提倡佛教，大修寺观，抄译佛经，还组织高僧或学士先后修成了开皇十四年的《众经目录》十四卷，开皇十七年的《开皇三宝录总目》十五卷，大业初的《大隋众经目录》。

史书专科目录的编制，是魏晋南北朝史学大发展的产物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目录类著录了杨松珍《史目》二卷，^⑫到《宋史·艺文志》则成为“杨松珍《历代史目》十五卷”。看来，杨氏的这部《史目》是通贯古今的历代史部书专科目录，而且自唐至宋屡有人为之增补，以至由二卷扩充到十五卷。杨氏另有《解颐》二卷，为《隋书·经籍志》子部小说类所录。清姚振宗考证：杨松珍或误作阳玠松，《解颐》又名《谈薮》，^⑬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七云：“《谈薮》二卷，北齐秘书省正字北平阳玠松撰，事综南北，时更八代，隋开皇中所述也”。据此，我们似可将《史目》的著作时间也定于隋开皇间。《史目》是第一部见于著录的史书专科目录，其开创体例本身，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。

隋代目录学的成就，植根于南北朝目录学的发展，更由于天

下的统一和书籍的大规模搜集。编制《众经目录》的释法经深有感触地说：前代“诸家经录所修撰不至详审者，非彼诸贤才不足而学不周，直是所遇之日，天下分崩，九牧无主，名州大郡，各号帝畿，疆场艰关，并为战国，经出所在，悉不相知，学者遥闻，终身莫睹。故彼前哲虽有才能，苦不逢时，亦无所申述也。当今（法）经等识学诚不及古而宿缘多幸，运属休辰，四海为家，六合清泰，殊方异域，宛在目前，正朔所颁，书轨无外，在域群生，莫不蒙赖，而况经等，夫复何论！”^{①⑦}

三、对书籍的校勘整理

古籍长期以抄本流传，讹脱衍倒本来就在所难免。况且南北朝时，人们抄书多不太认真，“至为一字，唯见数点，或妄斟酌，逐便转移，尔后坟籍，略不可看”。^{①⑧}在这种情况下，虽然搜聚了大量书籍，若不加认真校勘整理，仍不能使用。

隋代对书籍的校勘整理实行有司专责与学者参与结合的办法。秘书省是国家专门负责书籍搜求、整理、编目、校勘和收藏的机关。秘书省有监、丞各一员。文帝时，该省设校书郎十二人，负责校勘书籍，又有正字四人，录事二人，负责图书的文字归正与书目的登录。炀帝时，由于书籍大增，秘书省官员加至一百二十员，并以学士补充。^{①⑨}隋代较著名的学者，如牛弘、姚察、王劼、许善心、李文博、虞绰等都曾在秘书省任职。此外，还广泛动员经史专家参加书籍的整理校勘，如开皇十七年，许善心“奏追李文博、陆从典等学者十许人，正定经史错谬”。^{②⑩}

隋代整理古籍的办法，主要有以下五种：

（一）考定真伪，摒弃伪书

山东大学已故黄云眉教授指出：古籍的辨伪，是“整理大量文献工作中之首要课题”。^{②⑪}

在各类书籍中，隋代对佛经的辨伪最为突出。开皇十四年沙门法经感慨“自道淡情华，真伪玄隔，人鲜宗敬，虽有若无”。要在撰述的目录中“粗显传译是非，真伪之别”。^②他主撰《众经目录》时，将来历不明，真伪未分的经置于“疑惑”类，将肯定为伪经的定于“伪妄”类，两类皆入存目，并据之把真佛经写定入藏，将疑惑与伪妄之经摒弃不录。大业初年，沙门智果等人整理佛经目录，也是将“似后人假托为之者，别为一部，谓之疑经”。^③

佛经辨伪的盛行，带动了对经史子书的辨伪。《山海经》既称为夏禹和益所著，却又有长沙、零陵、桂阳、诸暨等秦、汉郡县的名称，于是有人对该书的真伪提出了疑问。颜之推列举《本草》、《尔雅》、《春秋》、《世本》、《苍颉篇》、《列仙传》、《列女传》等书皆有其作者身后内容的例子，说：“史之阙文，为日久矣，加复秦人灭学，董卓焚书，典籍错乱，非止于此。譬犹《本草》，神农所述，而有豫章、朱崖、赵国、常山、奉高、真定、临淄、冯翊等郡县名，出诸药物……皆由后人所搀，非本文也”。^④指出了古籍中大量存在后人附益之文的问题，为后代学者彻底查清这些古书的真伪奠定了基础。至于时人的造伪，往往当即被揭发，如刘炫伪造《连山易》、《鲁史记》等书百余卷，就“有人讼之，经赦免死，坐除名，归于家”。^⑤应该指出，隋代学者对经史的辨伪尚处于初级阶段，不仅没有专门的辨伪著作，而且对后来查为伪作的如《古文尚书孔传》等奉为至宝，谬种流传，影响深远。

（二）统一声韵，音释经史

隋代古籍整理的内容之一，是对儒家经典和重要史籍读音的注释。

当时，为了教授弟子的需要，很多学者热衷于古籍读音的考订。柳晋精于《史记》读音，包恺精于《汉书》读音，释道騊是研究《楚辞》读音的专家，都有著作传世。陆德明更是在文化史

上影响很大的人物，他的《经典释文》三卷，是一部集大成的音释群经的著作。该书“采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家，又兼载诸儒之训诂，证各本之异同”。^{②6}为《周易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三《礼》、三《传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尔雅》正音，对其中的《孝经》、《老子》还附以音注，罗列同一字的诸家读法，及其在不同义项时的多种读音。为区别起见，音经用墨书，音注用朱书，反映了当时注书制度的进步。

当时学术空气很活跃，学者还经常聚集起来讨论音韵之学。鉴于长期分裂，各地方言“声调既自有别，诸家取舍亦复不同，吴楚则时伤轻浅，燕赵则多伤重浊，秦陇则去声为入，梁益则平声似去，又支脂鱼虞共为一韵，先仙尤侯俱论是切”，大家越来越感到在大统一的形势下，应该有统一的音韵标准。颜之推、肖该、魏澹、刘臻、陆法言等人每聚集一起，就“论南北是非，古今通塞”，从而“更摭选精切，除削疏缓”，^{②7}讨论出了比较一致的意见。素有家学的陆法言将诸人的意见斟酌综合，终于在仁寿元年编成了音韵学专著《切韵》五卷。该书问世以后，前人所作韵书陆续亡佚。唐代作诗，奉《切韵》为典范。后起的《唐韵》、《广韵》等书，也是对《切韵》因革的产物。范文澜先生指出：“《切韵》统一了书面的声韵”，是自秦朝用小篆统一文字形体以后，汉族文字语言的第二次大进步。^{②8}

（三）考证群言，勘定文字

隋代学者在校勘古籍时，做了大量订正文字的工作。王劼长期任秘书监，他将校勘中发现的“经史谬误”，写成了《读书记》三十卷，“时人服其精博”。^{②9}该书早已佚失，但唐人经史注疏中多有引用，我们从中可以得知其大概情形。比如，为了查考《礼记·曲礼》中“稷曰明粢”一句的有无，他查勘了晋宋古本，立八疑十二证，肯定了这四个字是后代衍入的。他还用本校

法发现古籍中的问题，如《史记·吕不韦列传》中有“始皇十九年太后薨，谥为帝太后”。王劭根据《秦始皇本纪》中废除谥法的记载，指出：“秦不用谥法，此盖号耳”。王劭校书大量采用的是它校法。如《史记·孟尝君列传》云“田婴者，齐威王少子，而齐宣王庶弟也”。王劭写道：“按《战国策》云：齐貌辨谓宣王曰，王方为太子时，辨谓靖郭君，不若废太子，更立郊师。靖郭君不忍。宣王太息曰：‘寡人少，殊不知此’。以此言之，婴非齐王弟明也。”他也用理校法，如“《孟子荀卿列传》‘孟轲，邹人也，受业子思之门人’。‘人’为衍字，轲亲业孔伋之门也”。^{③⑥}

颜之推也是隋代一位校勘古籍的名家，他的《训俗文字》、《证俗音字略》两书和《颜氏家训》中的“书证”、“音辞”等篇，都是他总结校勘成果的专著。以下仅从“书证”中摘引数条，以见其校勘方法的细密。他曾通过同义词的训诂校勘出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的字误。如说：“太史公论英布曰：‘祸之兴自爱姬，生于妒媚，以至灭国’。又《汉书·外戚传》亦云：‘成结宠妾妒媚之诛’。此二媚并当作媚，媚亦妒也，义见《礼记》《三苍》。且《五宗世家》亦云：‘常山宪王后妒媚’。王充《论衡》云：‘妒夫媚妇生，则忿怒斗讼’。益知媚是妒之别名。原英布之诛为意贲赫耳，不得言媚”。他也运用不同地区的抄本校出误字。如“《后汉书》酷吏樊晔为天水郡守，凉州为之歌曰：‘宁见乳虎穴，不入冀府寺’。而江南书本穴皆误作六。学士因循，迷而不寤。夫虎豹穴居，事之较者；所以班超云：‘不探虎穴，安得虎子’？宁当论其六七耶？”他曾利用出土权铭纠正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传写之误。原来，开皇二年五月，长安民掘到秦时铁称权，旁有铭文，其中之一是“乃诏丞相状、绾，法度量则不壹，嫌疑者皆明壹之”等语，颜之推奉命写读此铭，从而指出通行的《始皇本纪》中“二十八年，丞相隗林、丞相王

绌等议于海上”中的“隗林非也，当为隗状耳”。他还根据多种古籍碑文的校比，指出：伏、虑为古通用字，陈、阵为古今字等，都很有见地。中国的考据学，到清代进入了全盛，但其主要方法，在隋代已基本产生。

（四）训诂经史，阐述文义

隋代学者对古籍的注疏很有成绩，他们常“共论古今滞义，前贤所不通者”，^③解决了不少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。

当时最重视对儒学经书的注疏。牛弘、何妥、刘炫、刘焯都是名盛一时的大儒。其中刘焯、刘炫造诣更深，对五经各自全面研究注疏，对《左传》功臣杜预也规其过，提出一百五十多条商榷意见。唐初撰《五经正义》就多据二刘义疏。孔颖达称二刘“聪颖特达，文而又儒，擢秀干于一时，骋绝轡于千里，固诸儒之所揖让，日下之无双。”^④褒慕之意，无以复加。大业间，龙门王通更以著作新经来阐述儒学宗旨。王通著有《礼论》、《乐论》、《续书》、《续诗》、《元经》、《赞易》，合称“王氏六经”。^⑤他根据大分裂以后大统一的时代特点，主张以儒学为基础，儒佛道三教合一，用复兴礼乐的办法使人民的思想意识也适应新的时代，实际上是从哲学思想上为巩固统一提供理论根据，在隋唐“地主阶级经济政治复兴上，起了相当的作用。”^⑥

隋代为史部书籍作的新注以《汉书》最盛。肖该、包恺各著《汉书音义》十二卷，姚察有《汉书训纂》三十卷、《定汉书疑》二卷，于仲文有《汉书刊繁》三十卷，在唐代都很有影响。其它典籍，如《史记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帝王世纪》、《法言》、《文选》等也都有人作注。

（五）编纂类书，以广其用

类书的撰集，是对古籍的一种综合性整理。隋代在书籍数量空前增多和科举取士制度产生以后，为了供帝王阅读和士人临文寻检之用，编纂类书的风气很盛，不仅种类较多，而且内容丰

富，卷帙庞大，价值较高。

开皇中杜台卿编成的《玉烛宝典》，是一部讲农时民俗的专科类书。原书十二卷，尚存七卷，系清末杨守敬自日本抄得。宋陈振孙评介该书“以月令为主，触类而广之，博采诸书，旁及时俗，月为一卷，颇号详洽”。^⑤

大业初年，则有四百卷的《长洲玉镜》这样一部供帝王阅读的百科类书的编纂。系由虞绰、虞世南、庾自直、柳谔、王曹等人共修。

又有诸葛颖编撰的《玄门宝海》一百二十卷。本传称颖“习《周易》、图纬、《仓》、《雅》、《庄》、《老》，颇得其要”。看来，这是一部关于道家学说的专科类书。

《宋史·艺文志》类书类著录有杜公瞻撰《编珠》四卷。杜在隋任著作佐郎，《自序》称系奉敕撰进。该书残本是高士奇从内库废纸中发现，遂为之补辑成书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因该书世无传本，而认为高氏所见残本“出自明中叶以后”。周中孚更怀疑“此书与所补所续均江村（高士奇字）一手所撰，并伪撰杜氏原序以实之尔”。^⑥按，该书前有徐乾学序。以徐氏的学识，当不肯为高氏自伪之书作序。江村伪撰说似不能成立。而徐氏又是明史专家，如若其书出明人所伪，徐氏也不应毫无察觉。该书原目分天地、山川、居处、仪卫、音乐、器玩、珍宝、繒綵、酒膳、黍稷、菜蔬、果实、车马、舟楫计十四门，是一部门类较广篇幅不大的事物百科类书。

隋炀帝还敕令秘书博士曹宪等编了一百卷的类书《桂苑珠丛》，被时人称为“该博”。^⑦该书失传已久，内容不得而知。

《北堂书钞》是隋代编成而流传至今的一部类书。虞世南任秘书郎时，在秘书省后堂“钞经史百家之事以备用”，^⑧遂成该书。是书原为一百七十三卷，分八十部，八百零一类。据说该书明代被陈禹谟窜乱，清代经孙星衍、严可均、孔广陶等人据元、

明诸本校勘加注，以《影印宋原本北堂书钞》的名称刊行，计分十九部，一百六十卷。学者多据古今本分部数量的差异，断定“虞氏原书已经散失很多”。^③我们细检今本，十九部内分八百五十一类，录二万一千余条，则恐今本与古本只是分部多寡的不同，原书不一定有多少散失。《北堂书钞》是一部供作诗文取材用的百科全书式的类书，一般每条皆据引书内容摘录出数字的提要，以下间或以双行略加注解或言其出处。由于该书引用了大量今已散佚不传的隋以前古籍，对于我们今天校订、辑录古书，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和隋代存世的年代相比，其搜集和整理古籍的成绩是突出的。但是，从本文中可以看出，隋代校勘古籍的传世作品毕竟不多，究其原因，以下几点值得注意。一，隋朝虽然实现了天下一统，但中后期政治局势不稳定。开皇时文化发展很盛，仁寿间因文帝废学校斥儒生受到打击，炀帝即位后又阿意兴工，对外征战，忌贤妒能，而且以武夫督察学士，使学者无法一以贯之地钻研学术。二，缺乏很好的组织来协调各种学术思想流派，阻碍了学者们更好地取长补短，发挥才能。一些学者积不相能，而使一些校勘工作不了了之。如开皇初，肖该与何妥奉诏正定经史，就“各执所见，递相是非，久而不能就，上谴而罢之”。^④三，秘书省官员待遇太低，从事古籍整理的学者贫困不堪，不得不另谋他职。正如李延寿所指出的那样，“古之学者，禄在其中，今之学者，困于贫贱。明达之人，志识之士，安肯滞于所习，以求贫贱者哉！此所以儒罕通人，学多鄙俗者也”。^⑤

注

①②《隋书·牛弘传》。

③《隋书·经籍志一》。

④《隋书·裴矩传》。

⑤《旧唐书·经籍志跋》。

- ⑥《旧唐书·经籍志序》。 ⑦《隋书·经籍志序》。
- ⑧《玉海·艺文类》。
- ⑨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二，隋炀帝大业十一年正月。
- ⑩《北史·文苑许善心传》。 ⑪《隋书·隐逸张文诩传》。
- ⑫《隋书·文学虞绰传》。
- ⑬⑳《隋书·许善心传》。
- ⑭《校雠通义序》。
- ⑮此书在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中著录为三卷。
- ⑯姚振宗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卷三十二。
- ⑰⑳释法经《上文帝进呈众经目录》，载《全隋文》卷三十五。
- ⑱《颜氏家训·杂艺》。
- ⑲《隋书·百官志下》，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。
- ㉑黄云眉《古今伪书考补证重印引言》。
- ㉒《隋书·经籍志四》。 ㉓《颜氏家训·书证》。
- ㉔《隋书·儒林刘炫传》。
- ㉕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三十三，经部，五经总义类。
- ㉖陆法言《切韵序》，载《全隋文》卷二十七。
- ㉗《中国通史简编》（修订本）第三编第一册，1965年版，页七十三。
- ㉘《北史·王慧龙传》。
- ㉙上述几条皆引自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卷六十八，王劭《读书记》。
- ㉚《隋书·儒林刘焯传》。 ㉛孔颖达《毛诗正义序》。
- ㉜《邵氏闻见后录》卷四，“司马文正公作文中子补传”。
- ㉝吕振羽《中国政治思想史》，三联书店，1955年版，页三百七十八。
- ㉞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六，时令类。
- ㉟《郑堂读书记》卷六十。
- ㊱《旧唐书·儒学上曹宪传》。
- ㊲晁公武《郡斋读书记》类书。
- ㊳刘叶秋《类书简介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版，页三十八。
- ㊴《隋书·儒林肖该传》。 ㊵《北史·儒林传论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兰州大学历史系